

居民消费增长的路径选择^{*}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陈忠斌 蔡东汉

【摘要】文章利用1991~2009年中国31个省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口、消费支出和收入的数据,基于居民总消费分解模型,进行省际面板回归估计。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对中国居民总消费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位列第二,但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农村向城镇人口迁移引起的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位列第三。考虑到城乡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差异,文章认为,居民总消费增长的路径将主要依赖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和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并提出通过制度改革增加居民收入、放宽并完善人口迁移政策等建议。

【关键词】居民消费支出 人口迁移 城乡人均消费差距 城市化

【作者】陈忠斌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蔡东汉 武汉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

一、引言

1998年前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首次遭遇通货紧缩和内需不足,使学术界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了对居民消费不足的研究。在大部分讨论居民消费不足产生根源的文章中,收入分配差距逐年扩大的现象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刘文斌,2000;袁志刚、朱国林,2002)。随后出现了许多关于收入分配与消费的研究文献,如吴晓明、吴栋(2007)运用1985~2004年城镇居民数据的计量分析发现,收入分配差距与总消费是显著负相关的。有些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消费差异的影响,张利庠(2007)认为,中国城乡二元消费差异不仅是由于体制的原因,而且具有内在的强化机制,并且会进一步加剧。

对于如何才能扩大居民消费支出,一些学者根据消费理论,认为扩大消费首先要增加居民收入。对于如何才能增加居民收入,杨汝岱、朱诗娥(2007)的研究表明,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主张通过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政策,壮大中等收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扩大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研究”(09YJA79015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具有人口转变时期人口变动的经济增长模型与仿真”(70871094)。

入者队伍,这将有利于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实现出由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向消费拉动型增长方式的过渡。林毅夫(2007)主张在一次分配中就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把二次分配作为补充手段。汪同三(2007)认为,要从制度上保护劳动者作为弱势一方的基本利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另外,有学者主张只有加快城市化才能扩大居民消费(裴志强、张萌,2010;田成川,2004;于淑波,2010)。李林杰等(2007)认为城市化促进消费增长的机制在于:城市化给城乡居民创造了提高收入的机会,改变了居民消费习惯,并对居民消费产生“累积效应”。主张在继续支持现有大中城市加快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小城镇的快速发展。刘志飞、颜进(2004)认为,要充分发挥大中城市在城市化中的中心骨干作用,以合理的方式对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进行城市化,使隐性城市人口显性化;此外,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进程,降低农民进城的迁移成本。增加居民收入、加快城市化,能够扩大居民消费已逐渐成为人们接受的事实。但城乡居民消费增长、人口城市化在多大程度上会促进居民总消费的增长,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定性分析上,定量研究显得比较薄弱。本文针对以往研究存在的不足,基于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在对居民总消费支出进行分解的基础上,对人口增长、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引起的消费增加,与居民总消费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并对各分解变量的贡献率进行了估算。

二、居民总消费增长的模型分解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居民的年人均消费支出远远高于农村居民的年人均消费支出。本文把国内居民消费支出分解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之和,动态地探讨城市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对居民总消费增长的贡献。

设 t 时刻消费为 $C(t)$,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总量和人均消费分别为 $C_i(t), i=1, 2$ 和 $c_i(t), i=1, 2$ 。 t 时刻的人口总量为 $P(t)$,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分别记为 $P_i(t), i=1, 2$;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所占比例分别记为 $\gamma_i(t), i=1, 2, \gamma_1(t)$ 也被称为城市化率。则有:

$$C(t)=C_1(t)+C_2(t)=P_1(t)c_1(t)+P_2(t)c_2(t)=P(t)[\gamma_1(t)c_1(t)+\gamma_2(t)c_2(t)] \quad (1)$$

式(1)两边同时对时间求导得:

$$\begin{aligned} \dot{C}(t) &= \dot{P}(t)[\gamma_1(t)c_1(t)+\gamma_2(t)c_2(t)]+P(t)[\dot{\gamma}_1(t)c_1(t)+\dot{\gamma}_2(t)c_2(t)]+ \\ & P(t)[\gamma_1(t)\dot{c}_1(t)+\gamma_2(t)\dot{c}_2(t)] \\ & = P(t)[\gamma_1(t)c_1(t)+\gamma_2(t)c_2(t)]\frac{\dot{P}(t)}{P(t)}+P(t)[\dot{\gamma}_1(t)c_1(t)+\dot{\gamma}_2(t)c_2(t)]+ \\ & P(t)[\gamma_1(t)\dot{c}_1(t)+\gamma_2(t)\dot{c}_2(t)] \\ & = C(t)n(t)+P(t)\gamma_1(t)\dot{c}_1(t)+P(t)\gamma_2(t)\dot{c}_2(t)+P(t)[\dot{\gamma}_1(t)c_1(t)+\dot{\gamma}_2(t)c_2(t)] \quad (2) \end{aligned}$$

其中, $n(t)=\frac{\dot{P}(t)}{P(t)}$ 为人口增长率, $0 < n(t) < 1$ 。

由于 $\gamma_1(t) + \gamma_2(t) = 1$, 其中 $0 < \gamma_1(t), \gamma_2(t) < 1$, 于是 $\dot{\gamma}_2(t) = -\dot{\gamma}_1(t)$, 式(2)化简为:

$$\dot{C}(t) = C(t)n(t) + P_1(t)\dot{c}_1(t) + P_2(t)\dot{c}_2(t) + P(t)\dot{\gamma}_1(t)[c_1(t) - c_2(t)] \quad (3)$$

式(3)右边第一项考察的是人口增长所引起的居民消费的增长;第二项为城镇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增长所引起的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第三项为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增长所拉动的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第四项表示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所引起的消费支出增长。在二元经济条件下, $\dot{\gamma}_1(t) > 0, \dot{\gamma}_2(t) < 0$, 故 $\dot{\gamma}_1(t)$ 刻画了每年农村向城镇的人口迁移速度, $P(t)\dot{\gamma}_1(t)$ 刻画了每年农村向城镇迁移的人口数量, 而 $c_1(t) - c_2(t)$ 是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差距。从式(3)可以得出, 居民总消费的增长依赖 4 个因素:(1)人口增长引起的居民消费支出增长;(2)由年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引起的城镇居民消费增长;(3)由年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引起的农村居民消费增长;(4)农村向城镇的人口迁移引起的居民消费增长。

由于近年来人口增长速度 $n(t)$ 较为缓慢, 式(3)右边第一项对居民总消费增长的贡献较小;而第二项和第三项对居民总消费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城镇与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上 [$\dot{c}_1(t), \dot{c}_2(t)$], 随着城镇和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的持续增长, 将会促进居民总消费支出的增长;由于中国城镇与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的差距在逐年扩大, 而农村向城镇的人口迁移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 [$\dot{\gamma}_1(t) > 0$]。因此, 式(3)右边第四项对居民总消费增长也将做出贡献。

三、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本文实证分析的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年鉴(2011)》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数据包括中国 31 个省份, 时间跨度为 1991~2009 年。由于模型考察的是居民总消费增长 $\dot{C}(t)$ 和城乡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增长 $\dot{c}_1(t), \dot{c}_2(t)$, 以及乡城人口迁移速度 $\dot{\gamma}_1(t)$, 因此省际面板计量分析的时间跨度减少一期, 即为 1992~2009 年。(1)居民消费支出采用 $P_1c_1 + P_2c_2$ 得到的居民总消费支出的数据, 没有采用最终消费支出中的居民消费支出数据。(2)31 个省份的城镇、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性支出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①。需要说明的是, 中国农村居民家庭的年人均消费性支出略高于家庭年人均现金消费支出。(3)北京、上海只有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城市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用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来代替;天津、重庆只有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用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代替。(4)本文中吉林省 2001~2009 年的年底总人口、城镇人口、乡村人口数据来自吉林省 2001~2009 年各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9 年的数据与 2010 年《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数据一致^②。(5)居民消

^①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http://db-edu.cei.gov.cn/scorpio_online/aspx/main.aspx?width=1014&height=708。

^② 吉林统计信息网 <http://tjj.jl.gov.cn/tjgb/ndgb/>。

费支出、城镇和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性支出、城镇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等名义值,分别按照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1990=100)、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90=100)、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90=100)调整为实际值(实际值=名义值/CPI)。在此基础上根据式(3)进行实证拟合分析。

四、居民总消费增长模型的回归估计

基于式(3)分别进行3种回归估计,然后选取其中最合理的面板回归估计结果进行分析。第一种是所有系数都不随时间和个体而变化的回归估计方法,也就是不考虑空间和时间的混合数据,只进行OLS回归估计;第二种是假定每个省份的斜率系数不变而截距随个体而变化的固定效应(FEM)回归估计方法;第三种是假定每个省份的截距都有一个相同的均值,并且每个省份截距值的个别差异都反映在误差项中的随机效应(REM)回归估计方法。

首先,运用F检验比较基于回归模型(3)的第一种方法和第二种固定效应方法(FEM)哪个更好;然后,运用豪斯曼(Hausman)检验比较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和随机效应回归模型哪个更好。最后,选择通过检验的最佳回归模型。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不仅存在着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经济特点,而且东中西部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发展差距。为了分析不同地区居民总消费增长的影响,本文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划分标准,将中国31个省细分为东部(10省)、东北和中部(9省)、西部(12省)。东部、东北和中部、西部的回归模型的选取方法与全国31个省的回归模型的选取方法相同,模型(3)的回归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中31个省份、东部、东北和中部、西部的4个分解变量的t统计值都在1%的显著性条件下显著,说明这4个分解变量对总体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都有显著的影响。

表1 总消费增长的回归估计结果(1992~2009年)(CPI, 1990=100)

	全国31个省(FEM)	东部10省(FEM)	东北和中部9省(REM)	西部12省(FEM)
$C(t)n(t)$	0.705251*(66.24)	0.659391*(140.69)	0.96625*(24.04)	0.513999*(12.09)
$P_{\dot{c}_1}$	0.971322*(98.14)	0.997994*(196.88)	0.978082*(36.74)	0.95236*(72.07)
$P_{\dot{c}_2}$	1.030973*(60.71)	1.025237*(94.78)	1.037634*(28.37)	1.044839*(70.14)
$P\dot{\gamma}_{(c_1-c_2)}$	0.916516*(103.89)	0.921004*(113.27)	0.921396*(19.82)	0.916433*(215.55)
截距	1.26E+08*(3.11)	1.72E+08*(5.31)	-4909561(-0.05)	1.62E+08*(5.46)
R ²	0.99442	0.999557	0.975432	0.998161
F	2321.903	21183.56	1558.334	5933.098
obs.	478	136	162	180

注:(1)括号为t统计值。*表示t值在1%的显著性条件下显著。(2)回归分析检验时将东北3个省合并到中部6个省,因为东北3省的省际数太少,Eviews6.0软件无法对东北3个省进行面板的随机效应回归检验。

表2 各变量对居民总消费增长的贡献

%

(一) 人口增长

对消费支出的影响

全国 31 个省的 $C(t)n(t)$ 系数 0.7053, 表明人口增长引起消费支出增加 100 元, 将拉动居民总消费支出增长 70.53 元 (见表 1)。人口增长引起

	年份	全国 31 个省	东部 10 省	东北和中部 9 省	西部 12 省
$C(t)n(t)$	1992~2000	12.40	15.52	10.91	11.14
	2001~2009	6.24	10.66	0.26	1.82
$P_{\dot{c}_1}$	1992~2000	53.02	53.23	43.58	71.93
	2001~2009	56.13	56.22	57.48	55.87
$P_{\dot{c}_2}$	1992~2000	27.45	33.63	30.81	13.22
	2001~2009	26.29	21.31	30.49	32.88
$P_{\dot{\gamma}_1(c_1-c_2)}$	1992~2000	8.36	11.91	14.89	-9.48
	2001~2009	10.50	11.30	11.68	6.57

消费支出增加, 对居民总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从 1992~2000 年的 12.4%, 下降到 2001~2009 年的 6.24% (见表 2)。从 1992~2000 年到 2001~2009 年, 东部、东北和中部、西部的人口增长引起的消费支出增加, 对居民总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 东北和中部的贡献率从 10.91% 下降到只有 0.26%; 西部的贡献率从 11.14% 下降到只有 1.82% (见表 2)。数据显示, 全国 31 个省份、东部、东北和中部、西部 1991~2000 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 0.913%、0.637%、0.861% 和 1.198%; 2001~2010 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 0.557%、0.454%、0.442% 和 0.729%^①。显然, 由于人口增长率的下降, 导致人口增长引起的消费支出增加, 对居民总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这表明通过人口增长来促进居民总消费支出增长的思路是行不通的。

(二) 城镇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对居民总消费支出的影响

31 个省份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系数为 0.9713, 表明城镇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增加所引起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每增加 100 元, 将拉动中国居民总消费支出增长 97.13 元 (见表 1)。由城镇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增加引起的城镇居民消费增长, 对居民总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从 1992~2000 年的 53.02% 上升到 2001~2009 年的 56.13% (见表 2)。

与全国的情况相似, 东部、东北和中部、西部 3 个地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系数都接近 1 (见表 1)。从 1992~2000 年到 2001~2009 年, 东部的贡献率从 53.23% 上升到 56.22%; 东北和中部的贡献率从 43.58% 上升到 57.48%; 而西部地区的贡献率从 71.93% 下降到 55.87% (见表 2)。2001~2009 年, 全国及东、中、西部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对总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都在 56% 左右。这表明扩大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将有利于居民总消费支出的增长。这与理论模型分析的结果完全吻合。

全国、东部、东北和中部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的上升, 可以用城市化率 (γ_1) 的上升来解释; 而西部地区贡献率的下降同样可以用城市化率的下降来解释 (见表 4)。因为城市化率的高低意味着城市人口数量的上升或下降, 在城镇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逐年上

^①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http://db-edu.cei.gov.cn/scorpio_online/aspx/main.aspx?width=1356&height=704。

升的情况下,城市人口上升将会促进总消费支出的增长,相反,城市人口的下降也会导致消费支出的减少;另一个解释是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往往较高。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往往高于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另一方面2001~2009年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1992~2000年的边际消费倾向^①(见表3)。

(三) 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对居民总消费支出的影响

31个省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系数1.031,表明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增加所引起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每增加100元,将拉动中国居民总消费支出增长103.1元(见表1)。由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增加引起的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对居民总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从1992~2000年的27.45%,略微下降到2001~2009年的26.29%(见表2)。

与全国的情况相似,东部、东北和中部、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系数都略大于1(见表1)。1992~2000年到2001~2009年,东部的贡献率从33.63%下降到21.31%;东北和中部的贡献率从30.81%下降到30.49%;西部地区的贡献率则从13.22%上升到32.88%(见表2)。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数据显示,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仍然是促进中国居民总消费支出增长的重要因素。

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对居民总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下降,一是因为农村人口所占比例(γ_2)大幅度下降,从53.46%下降到44.4%(见表4);二是因为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幅度下降,从0.4937下降到0.1065。东北和中部地区贡献率变化不大的原因,可能得益于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幅度提高,从0.1432上升到0.4018, MPC_2 的大幅提高抵消了农村人口比例下降的影响;西部地区贡献率的大幅度上升,既得益于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幅度上升,从0.2296提高到0.6454(见表3),也得益于农村人口所占比例的上升,从60.41%上升到62.50%(见表4)。

尽管西部地区的乡城人口迁移速度从1992~2000年的0.26%提高到2001~2009年的0.52%(见表4),而同期西部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91~2000年的1.198%下降到2001~2009

^① 这里有两个例外:一是2001~2009年西部的 $MPC_2=0.6454 > MPC_1=0.5831$;二是东部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略有下降。1992~2000年的 $MPC_1=0.6481$,而2001~2009年的 $MPC_1=0.6216$ 。

表3 城市和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MPC)(CPI, 1990=100)

年份	模型(5)	全国31个省	东部10省	东北和中部9省	西部12省
1992~2000	MPC_1	0.616548*	0.648147*	0.707437*	0.550927*
2001~2009	MPC_1	0.630219*	0.621602*	0.772113*	0.583124*
1992~2000	MPC_2	0.337530*	0.493658*	0.143239	0.229640**
2001~2009	MPC_2	0.175983*	0.106459***	0.401819*	0.645449*

注:由于本文的数据是分省的面板数据,基于凯恩斯消费模型 $c_u=\alpha+\beta y_u$,对时间 t 求导,因此模型可以变为 $\dot{c}_u=\alpha+\beta \dot{y}_u$, $\dot{c}_u=c_u-c_{u-1}$ 代表各省份年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量, $\dot{y}_u=y_u-y_{u-1}$ 代表各省份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量, β 是边际消费倾向。 MPC_1 、 MPC_2 分别代表城市和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分别表示t统计值在1%、5%、10%的显著性条件下显著。

年的 0.73%。可以看出,尽管西部地区乡城人口迁移速度提高了 1 倍,但仍低于人口自然增长率,从而导致城市人口比例下降、农村人口比例上升这种违背规律的怪现象(见表 4)。本文推断,随着西部地区乡城人口迁移速度超过人口自然增长率,农村人口比例将大幅度减少,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对总体居民消费增长的贡献将趋于下降(类似东部贡献率的下降)。

(四) 人口迁移引起的消费支出对居民总消费支出的影响

31 个省份的农村向城镇的人口迁移所引起的消费支出增长的系数 0.9165,表明农村向城镇的人口迁移引起居民消费支出每增加 100 元,将拉动中国居民总消费支出增长 91.65 元(见表 1)。由农村向城镇的人口迁移引起的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对居民总体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从 1992~2000 年的 8.36%,上升到 2001~2009 年的 10.50%(见表 2)。

东部、东北和中部、西部地区农村向城镇的人口迁移引起的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系数都约为 0.92(见表 1)。1992~2000 年到 2001~2009 年,东部的贡献率从 11.91% 略微下降到 11.30%;东北和中部的贡献率从 14.89% 下降到 11.68%;西部地区的贡献率则从 -9.48% 快速上升到 6.57%(见表 2)。

东部地区农村向城镇的人口迁移速度从 1992~2000 年的 0.82% 上升到 2001~2009 年的 1.61%(见表 4),几乎增长了 1 倍,而贡献率却略有下降。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与东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都出现下降有关(见表 3)。另一个解释是东部地区的乡城人口迁移,主要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向东部地区的流动,而不是东部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这部分流动人口除了在东部地区进行一些必要的消费外,剩余的钱会储蓄起来,或汇向在农村老家的亲人,从而拉动户籍所在地的消费;东北和中部地区贡献率的略微下降可能源于乡城人口迁移速度的下降(从 0.92% 下降到 0.69%);西部地区贡献率的明显上升,得益于乡城人口迁移速度的明显加快,从 1992~2000 年的 0.26% 上升到 2001~2009 年的 0.52%(见表 4)。我们认为,随着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变成永久性地定居在城市,从短期看,这部分迁移人口因为城乡消费支出的差距会直接带动消费支出增长,从长期看,因为城

镇人口的上升必将拉动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最终促进居民总消费支出的增长。

表 3 显示,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呈现出倒 U 形,东北和中部的 MPC_1

表 4 城市和农村人口所占比例及乡城人口迁移速度 %

	全国 31 个省	东部 10 省	东北和中部 9 省	西部 12 省
城市人口比例(γ_1)				
1991~2000 年	40.21	46.13	37.00	39.29
2001~2009 年	44.55	55.29	42.72	37.31
农村人口比例(γ_2)				
1991~2000 年	59.57	53.46	63.00	60.41
2001~2009 年	55.22	44.40	57.10	62.50
乡城人口迁移速度($d\gamma_1$)				
1992~2000 年	0.64	0.82	0.92	0.26
2001~2009 年	0.91	1.61	0.69	0.52

最高,东部和西部的 MPC_1 较低。这与杨汝岱、朱诗娥(2007)的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呈倒“U”形关系的结论相吻合。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呈现出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的趋势。当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速度加快时,家庭年人均收入会增长,边际消费倾向会上升,对总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也会大大提高。正是由于东部、东北和中部的乡城人口迁移速度($d\gamma_1$)高于西部(见表 4),其对总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也高于西部(见表 2)。

有些学者认为缩小收入差距能起到提高总消费、扩大总需求的作用(杨汝岱、朱诗娥,2007)。由于消费的差距反映了收入的差距(Mark 等,2011),那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能否在未来 30 年内缩小?首先假定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与城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到 2039 年不至于比 2009 年扩大,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需要增长得多快(r_2)?为了分析这一问题,本文采用复合计算公式^①,计算结果显示,在给定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的情况下,如果保持农村和城镇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差距到 2039 年不至于比 2009 年扩大,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必须保持每年 11% 的增长率。事实上,1992~2009 年农村居民实际年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全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 3 省分别为 6.27%、6.85%、6.97%、5.28%、6.91%。显然,要想让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翻一番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这一结论意味着农村和城市居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在未来 30 年仍有可能继续扩大。主张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观点只能是一个良好的愿望。相反,鼓励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以及鼓励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就业的政策主张是合理可行的。因为从绝对值看,农村居民实际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城市居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增长率看,农村居民实际年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低于城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再加之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低于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鼓励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农村劳动力到城市从事非农工作,才是扩大居民总消费支出的明智选择。

五、结语

从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对居民总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而且趋于上升;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对居民总消费增长的贡献率位居第二但趋于下降;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引起的消费支出增长对居民总消费增长的贡献率位居第三;人口增长引起的消费支出增加对居民总消费增长的贡献率最低而且还在下降。综合考虑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低、农业收入增长速度慢、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低,以及城乡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在未来仍将继续扩大等因素,本文认为中国居民总消费的增

^① 根据复合计算公式 $y_1 - y_2 = y_1(1+r_1)^n - y_2(1+r_2)^n$ 得到 $r_2 = \sqrt[n]{[y_1(1+r_1)^n - (y_1 - y_2)]/y_2} - 1$ 。其中, r_1 为 1992~2009 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 y_1, y_2 分别为各地区 2009 年城市和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 n 假定为 30 年。计算结果显示,全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 3 省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分别需要达到 11.43%、11.74%、11.46%、11.62% 和 11.21%。

长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要依赖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以及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

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表面上依赖于城镇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实际上取决于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要增加居民收入,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鼓励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就业、大力发展战略都将是最明智的政策选择。当前,拓宽创业者的融资渠道,减轻中小微型企业的税收负担(例如,将服务业的营业税调整为增值税,提高税收抵扣额),将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从制度上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分配份额、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抵扣额、降低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同样会增加居民收入。中国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率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速度不快的事实表明,加快城市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加快农村人口融入城市,通过收入的提高,促进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支出的提高,最终将促进居民总消费支出的增长。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2007):《林毅夫:初次分配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中国证券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7-03/23/content_5886155.htm)。
2. 李林杰等(2007):《借助人口城市化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思路与对策》,《中国软科学》,第7期。
3. 刘文斌(2000):《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制约》,《经济学动态》,第9期。
4. 刘志飞、颜进(2004):《从居民消费角度看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城市问题》,第3期。
5. 裴志强、张萌(2010):《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加快城市化的发展》,《中国集体经济》,第6期。
6. 田成川(2004):《城市化:解决消费需求不足的必由之路》,《宏观经济管理》,第8期。
7. 汪同三(2007):《汪同三:改革收入分配体系解决投资消费失调》,《中国证券报》,中证网(<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jingjixueren/20071029/02444109667.shtml>)。
8. 吴晓明、吴栋(2007):《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与收入分配状况关系的实证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5期。
9. 杨汝岱、朱诗娥(2007):《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吗》,《经济研究》,第12期。
10. 袁志刚、朱国林(2002):《消费理论中的收入分配与总消费》,《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11. 于淑波(2010):《二元经济结构下人口城市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分析》,《商业现代化》,第25期。
12. 张利庠(2007):《二元结构下的城乡消费差异分析及对策》,《中国软科学》,第2期。
13. James C. Morley(2007), The Slow Adjustment of Aggregate Consumption to Permanent Income.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39, No.2/3, pp.615–638.
14. Liu Shaoquan, Chen Zhijian, and Chen Guojie(2004), Impact of Urbanization and Resettlement on Employment of Rural Inhabitants in China. *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Vol 24, No.3, pp.228–233.
15. Mark A. Aguiar, Mark Bils(2011), Has Consumption Inequality Mirrored Income Inequality? Working Paper 16807. <http://www.nber.org/papers/w16807>.

(责任编辑:朱 犀)